

品读

管子

管理之道

读管子之权，修与立政，其言二本，四固，五事，七观之篇，乃穷古今政治学之精理，学政者不读管子，而惟新书是求，未有其能也。此书之于政治学犹孙子之於军事学也。

——蒋介石

夏兰◎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朱晋平 王毅
版式设计 李灵
责任校对 王巍
责任印制 宋二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品读管子——管理之道/夏兰主编.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035-4063-9

I. 品… II. 夏… III. 管仲 (? ~前 645) —领导思想—研究 IV. B226.15 C93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8939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000 毫米×1400 毫米 1/16 印张: 16.5

字数: 254 千字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33.00 元

目录

管子卷第一

做多大的事就要有多大的眼界和气量
做官为政要讲究实实在在
官者要讲究“为官之道”
顺天道者生，逆天道者亡
官者要能够自我检讨、知错必改
赏罚分明才会天下安定
人才为本事半功倍
管理百姓要从小处着手
赏和罚都要众人心服
用人以德为先
凡事以身作则才能管理好人民

管子卷第二

为官做事要讲究方法
严惩奸邪之人以正法制
政令严明、公私分明才算英明

管子卷第三

处理政事要顾全大局
官者要以民为本

管子卷第四

树立自身权威才能政令通行
上行下效为民众树立榜样
刚柔相济才无懈可击

管子卷第五

欲取于民则先施于民
深谋远虑才能把握时机
不拘一格用人才
团结才能强大，孤立就会弱小
行权得当则天下归顺、太平

管子卷第六

君臣得位能相得益彰
知人善任者“明”

管子卷第七

君“倒”则臣乱
明察秋毫防止奸人作乱
有美行才能赢得美名
能够听取批评为明智
亲近贤者而远离奸邪小人

管子卷第八

不听信谗言、法纪严明以正君威

明辨是非、依法度行事才是治国之本
民富才能国强

管子卷第九

用人之所长、避其之所短
得民心才能天下归顺
造福天下者得天下
奉天行道者“大”
善借众人之力、虚心纳谏者明

管子卷第十

恩威并施方能统驭民众

管子卷第一

牧民第一

[原文]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

以上摘自《管子》“牧民第一”

[译文]

以治家的要求治乡，乡不可能治好；以治乡的要求治国，国不可能治好；以治国的要求治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要以治家的要求治家，以治乡的要求治乡，以治国的要求治国，以治天下的要求治天下。

不能因为不同姓就不听取外姓人的意见，不能因为不同乡就不采纳外乡人的办法，不能因为不同国就不听从外国人的主张。应该像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要像日月普照一切，才叫做有君主的气度。

[实例应用与分析]

做多大的事就要有多大的眼界和气量

“《管子》第一”中的上文部分表述了管子“治国、治乡、治天下”的谋略和方式，“以治家的要求治乡，乡不可能治好；以治乡的要求治国，国不可能治好；以治国的要求治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要以治家的要求治家，以治乡的要求治乡，以治国的要求治国，以治天下的要求治天下”，并且说明“应该像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要像日月普照一切，才叫做有君主的气度”。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做多大的事就要有多大的眼界和气量”。

管子的为政、治理之道为天下人所颂扬。“做多大的事就要有多大的眼界和气量”——自古至今许许多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胸襟狭窄的人不可能做出豪放之举，胸怀大志的人才有气吞山河的大气。

到了关键时刻，真正能够脱颖而出成大事的，往往都是那些有眼界和大气量的人。

一个有远见的人，往往能发现别人不曾发现的东西，也便成就了别人所不能成就的事业。他们能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去发觉隐含的“财富”，这就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关键。

左宗棠就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眼力之远，甚至超过了曾国藩。左宗棠的远见卓识让他认清，中国面临的重大威胁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因此他坚决主张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左宗棠亲率军队抵抗外国侵略者，同时全力发展本国的军事工业，成为中国军事工业领域伟大的奠基者。

晚清时期，国人面临的重大威胁就是外国列强的侵略。而当时清政府在海防方面，力量非常的薄弱。左宗棠此时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为求长远之计，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提出仿造外国轮船。

左宗棠的这一主张很快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一年后，福州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左宗棠认为，中国东南部的安危，完全取决于海防是否安全。自鸦片战争一来，西方列强之所以横行于中国沿海，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强大的海军。

左宗棠还深谋远虑地指出：“西方国家以及俄罗斯、美利坚，一直很讲究轮船的性能优劣，并相互借鉴改造，制造方法日趋成熟。东洋日本开始是买轮船，拆开研究后想仿造未能成功，近来又派人前往英吉利学习语言，以研究那些造船数据，这都是为仿造做准备。想必不久后，日本必然也能造船。而单单因为我们因军事繁忙，没顾得上研究。从长远来看，一旦日本造出船来，我们与之隔海相望，他们若来要挟我们，我们该如何反抗呢？”

左宗棠能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变化和局势的发展，真可称得上是高瞻远瞩，在当时实属难得。当时，中日两国的造船都处在起步阶段，左宗棠设厂造船的主张及行动，使中国的海防暂时没有落伍于日本。左宗棠的未雨绸缪，使他成为中国海防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人物，并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地影响。

左宗棠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敏锐的眼光，他站在智慧的高山上，所以也就眼界开阔、目光长远。他以常人难及的气量，别开生面、勇于创新，最终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由此可见，做多大的事，就要有多大的眼界和气象。

汉高祖刘邦正是因为有着远大的志向和开阔的眼界，才敢在秦末战乱的时代果断地组建军队，向秦朝发起挑战，最后建立了西汉王朝。

刘邦虽出身农家，但其为人豁达，常表现出宏大的气度，不屑于做那些普通人家生产和经营之类的事情。

刘邦曾做过沛县泗水的亭长，因为不满足于做这样的小官，他经常对府中的官吏加以调侃讽刺。有一次，刘邦遣送一批刑徒前往骊山修墓，途中，有很多刑徒陆续逃亡，刘邦不甘久居人下，干脆把其余的刑徒都放走了，自己躲到丰西的大泽中。

秦二世元年秋，陈胜、吴广起义反秦。刘邦受萧何、曹参等拥戴，也在沛县聚众响应，后被拥立为沛公。第二年，刘邦投奔项梁，多次与项羽协同作战。项梁死后，刘邦被封为武安侯、砀郡长。

后来，刘邦收集陈胜、项梁的剩余兵马数千人西向攻秦。公元前 206 年刘邦军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

此后，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令其统治巴蜀地及汉中一带。刘邦不甘心亡秦的胜利果实被项羽独占，率军东出，随之发动楚汉战争。刘邦与项羽抗争两年多的时间，最终迫使项羽订鸿沟之盟。五年十二月，刘邦大军围歼楚军于垓下，统一天下。刘邦遂称帝，建立汉朝。

刘邦胸怀大志，不甘屈居人下，当年他在咸阳服役看到秦始皇的时候，就曾慨叹道：“大丈夫就应当是这样的啊！”

正因为有着远大的抱负，刘邦认定自己必是做大事之人；正因为有着长远的眼光，他才果敢地起兵反秦，最终当上了皇帝。

为官者往往都具有匡扶天下的志向，但光有志向还不够，若想取得功绩，还需有眼光。

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大眼界，往往就表现在这些常事上，一个眼界开阔的人，在择主方面是绝对不会马虎的，因为他们深知，只有选对了人，才是日后建功立业的基础。

诸葛亮的择主就很能体现他的眼光之远。诸葛亮生活的年代，群雄逐鹿、英雄辈出。曹操精通谋略、智慧过人，但诸葛亮反感于他在徐州时的滥杀无辜，也早看穿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野心，因此他没有选择投靠曹操。

诸葛亮的兄长江东效力，江东拥有长江天险，而且贤人众多，而诸葛亮却说：“孙将军可谓人主，不过我观察他的气度，能重视我而不能尽用我，我所以不往。”

刘璋，割据着长江上游的益州。此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刘璋为人怯懦，没有太大的作为，诸葛亮更是看不到眼里。

当时的刘备是个常败将军，仅是寄居在荆州刘表门下。但刘备屡败屡战，有种从不服输的精神，而且他为人正直、胸襟开阔，待人宽厚大度，能够礼贤下士、任人唯贤。诸葛亮认定，与此人共事，自己的才华定能得到展示和发挥，于是，决定投奔刘备。

后来的事实证明，诸葛亮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归入刘备门下之后，受到刘备的重用。他联孙抗曹，大败曹军于赤壁，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并夺占了荆州。建安十六年，又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二十六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诸葛亮的才能之所以能够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不得不归功于他在择主方面眼界的高远。

而更能证明诸葛亮的聪慧和眼界宽广之处的还得数他对天下形势的认识。

早在刘备“三顾茅庐”时，刘备就曾问诸葛亮统一天下大计，年仅27岁的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首先夺取荆、益作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北伐，从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后人称诸葛亮“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由此可见诸葛亮的眼界之远。

诸葛亮把领导者的素质看得比实力更加重要，把未来看得比眼前更重要，这充分显示了诸葛亮洞悉、把握局势的非凡才能。可见，要想成大事，就需拥有宽广的眼界。

身处官场，危机重重，诱惑也种种，只有目光长远者，才能不被眼前的利益所动，实现更加远大的追求。

东晋名臣谢安在年轻时就很有威望，朝中大臣王导因爱惜人才而征召谢安入朝为官。

谢安问前来的使者道：“朝廷任命我做什么官呢？”

使者回答说：“佐著作郎。”

谢安一听是这么一个官位低微之职，便借口有病而谢绝了。

有人知道后责怪谢安说：“王导是有名的贤臣，他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佐著作郎官职虽小，但它可是晋升的台阶，你怎能拒绝呢！”

谢安笑着说：“我之所学，不是为了当一个佐著作郎，我的学问是为当丞相准备的，只有当了丞相，才能更好的施展我的才华，为百姓做些事情。”

扬州刺史庾冰闻知谢安大名，十分仰慕，他派属下劝说谢安做官，为朝廷出力。谢安推辞不掉，决定出山。

可刚一月有余，谢安就提出辞职。原来他觉得官场上勾心斗角，根本就没有人真心为百姓操劳，加上官场上虚伪之处太多，这让谢安烦不胜烦。

谢安对人说：“轻易应召，只会让人看轻，别人从此就不会看重我了。一点小利便动心，这和俗人有何不同？目光如此短浅，还会有大作为吗？”

谢安喜跟名士交往，常和王羲之等人吟诗作对，畅谈天下，因此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朝廷一次次地征召他。直到他四十岁时，他才决定重新开始仕途生涯，不久就位极人臣。后来，他指挥了著名的“淝水之战”，为朝廷立下了不朽功勋。

谢安的成就，是在他放弃眼前小利之后获得的，如果他当年仅满足于做个小吏，也就不会有日后的显达。只有那些把目光放长远，放弃眼前蝇头小利的人，才会得到更多的收获。

眼光长远的人往往能看到隐藏的机会，气量宏大的人往往能成就不可能之事。晏殊的成功就很能说明这其中的道理。

晏殊是北宋前期的著名词人。宋真宗时，晏殊在朝中做官，虽官职低微，做事却勤勤恳恳、不知疲倦。

当时，政治黑暗，许多官吏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晏殊却一门心思工作，不肯随波逐流。

一次，晏殊的同僚拉他出去游玩，晏殊说：“我不是不想游玩，只是我俸禄不多，哪里玩得起呢？”

同僚要为他付账，晏殊更是生气的拒绝道：“人生乐事，当在自食其力，若是依靠别人施舍，还有什么快乐可言？你们不要侮辱我了。”

晏殊身为小吏，却是事无巨细，上上下下的琐碎事都由他来处理，并乐此不疲。

有人问道：“你这样辛苦地做事，不觉得厌烦吗？有些事应付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那么认真。”

晏殊说：“我官小职微，又没有靠山，若不踏实做事，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呢？我和别人的情况不同，也无法和别人相比。我趁机磨练我的性情，有什么不好呢？”

晏殊把眼光放到长远，不计较当前的得失与境况的落魄，而且为人谦虚仁厚。朝中有一名官员受贬离京，很多官员都站在一边看热闹，晏殊却写了一篇赠别词送给他，别人都笑话他的举动，晏殊却没有生气，而是大度地对那些人说：“他和我是同僚，虽然交情不深，但我也要略表寸心。我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资格笑话人家。”

后来，宋真宗为太子选老师，有人推荐了晏殊，并以不游玩和送人赠词两事为例，来说明他高尚的人品。

晏殊却对真宗说：“我没有大家说的那么好。我不玩乐，是因为没有钱；我做事认真，是因为想晋升官职。”

宋真宗夸他真诚坦率，放心地把太子交给他辅佐。最后，晏殊当上了宰相。

晏殊不因身处穷困而自暴自弃，而是把志向定在将来。眼光长远了，做事也就有了目标。而晏子的气量也是非凡的，他能忍别人所不能忍，背负着众人的讥笑而认真做事，在那个崇尚享乐的年代，他始终兢兢业业、洁身自好，实属不易。

为官者，眼界重要，气量也很重要，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有时候，气量不但可以使一个人驱凶避祸、化险为夷，还可以使一个人拥得人心、步步高升。

曹操就是因为有气量而最终把名士许攸收至门下，从而大大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许攸原是袁绍帐下的得力谋士之一。曹操久闻许攸大名，便派人游说许攸说：“我家主公仁爱尊贤，早晚必成大事。你若投靠到我家主公门下，他一定会重用于你。”

许攸听后答道：“曹操表面谦恭，实际上奸诈凶险，他怎么会真心对我好呢？我是不会被欺骗的。”

使者把许攸的原话告诉了曹操，曹操却没有生气，他对手下说：“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上策。许攸不投降于我，还是我的诚意不够啊。”

接着，曹操又派人前往，而且带了厚礼。可这次许攸更加不客气了，不等使者开口劝降，许攸便破口大骂道：“曹操小儿以为我是小孩吗？这点钱财就想买我万千士卒！真是欺人太甚，日后我抓到他，一定把他碎尸万段！”

曹操这次被激怒了，他生气地说：“许攸不识抬举，对我如此无礼，我一定要消灭他！”曹操的谋士杜袭劝他说：“主公千万不要和许攸计较，现在大敌当前、豺狼当道，我们的敌人不止一个。你要称雄天下，就要放开心胸，尽力收服像许攸这样的小股势力。只要你忘记许攸的不敬，再对其加以耐心的劝说，他一定会归降的。”

曹操觉得他说的很对，又多次派人招降许攸，最后终于感动了许攸，把他收归到了自己

门下。

曹操有做大事的气量，他原谅了许攸的无礼，换来了许攸的归降。可见，要想成就大事业，首先需有大气量。

通过这些历史事例我们可以看到，眼界和气量是成功者必备的素质，做多大的事就要有多大的眼界和气量。

形势第二

[原文]

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术，非驭也；奚仲之巧，非斫削也。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也。

以上摘自《管子》“形势第二”

[译文]

神射手后羿的功夫不在于射箭的模样，神驭手造父的技术不在于驾车的动作，神匠奚仲造车的技巧，也不在于木材的砍削上。

召徕远方的人，单凭使者是不行的。亲近身边的人，光说空话同样是不可以的。只有真正修养德行的君主，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实例应用与分析]

做官为政要讲究实实在在

“《管子》第一”中的上文部分表述了管子对统治者为官做事的看法，“神射手后羿的功夫不在于射箭的模样，神驭手造父的技术不在于驾车的动作，神匠奚仲造车的技巧，也不在于木材的砍削上”，说明做事真正讲求的不该是外在的花架子，而是实实在在的成绩和结果。

“只有真正修养德行的君主，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则把做事与为政相结合，说明做官为政讲究实实在在的东西，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做官为政要讲究实实在在”。

管子对为官之道的见解值得世人去追捧和深思。“做官为政要讲究实实在在”就是管子对官场之人的劝导。“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一首民间顺口溜，它一针见血地体现出了民众对为官之人的期望，这也是有良知的官者的“座右铭”。

做官不能搞花架子敷衍了事，这样的官者不是人民爱戴的。实实在在做官，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不以大事为大，不以小事为小，哪怕是一些芝麻小事也要尽可能解决人民的疾苦，这才是为官的本份。

但凡能够本着实实在在做官为政之人，都是能够受到民众拥戴和歌颂的，从而流芳千古。

历史上一些贤明的君主，从为君不实的昏君身上吸取了教训，他们或是以仁爱待民，或是以勤政治国，和那些昏君不同的是，他们不仅皇位长坐，而且还千古流芳，这两者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雍正帝就是一位实实在在的贤君。

雍正帝为政之勤，无人能及。他处理朝政，从早到晚，没有停歇，一般都是白天同臣子议政，晚上批阅奏章，经常批至深夜，天天如此，寒暑不断。雍正虽身为天子，但一刻都不敢贪图安逸。经他亲手批阅的奏章，现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就有二万二千余件，而这还不

是全部。

雍正为帝之勤，与他以治理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他曾明确地讲过，他是因为感到治理大清江山的责任重大，故而勤于政务，不敢稍有懈怠。

雍正帝早年在夏天中过暑，因而特别畏惧酷暑天气。每一年酷热难耐之际，每当意欲休息时，想到前贤的箴言、帝王的责任，便不敢浪费一刻时光，而是勉励自己更加努力地去处理政务。

他深感登基以来，民风未淳，自己身为一国之君，责任未尽，因此朝夕谨慎、不敢怠惰，甚至没有时间和心情去欣赏春色美景。

清史专家孟森先生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雍正帝者。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

雍正帝以民为本、以国为重，他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是大清朝的日渐昌盛，这种为君实实在在的作风不仅让当时的天下人心服，而且也让后来之人对其赞叹有加。为君实与不实的结果差异不可谓不大。

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位实干家，在他领导下的湘军，个个是做事的能手，而且战斗力非凡，这其中的奥妙可以归结为四个字——实实在在。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其才气很受曾国藩的赏识。但李鸿章的性格里面有虚伪的成份，曾国藩对此很是不满。因此，曾国藩常拿自己的“内圣”之法教育他。

曾国藩的所谓“内圣拙诚”也就是埋头苦干的意思，他认为人应该多做实际工作，尤其是为官者，应该实实在在的为民做事，而不是只知道做表面文章。那些专说大话而不知实干的人，是最让曾国藩瞧不起的。身为湘军的首领，他的部下都是些不善言辞的“实干家”，曾国藩认为湘军之所以能胜利，皆取决于“内圣拙诚”。

为了贯彻他的“内圣拙诚”，曾国藩又创立了“五到”之说。这“五到”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曾国藩说：“身到者，如做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终条理，先要学得开，后要括得拔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键，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叮咛也。”

曾国藩的“五到”，皆是说要脚踏实地、不厌其烦、不怕艰难地埋头苦干，也就是所谓的“实干精神”。带着这种积极的心态，曾国藩时刻准备着为国出力。他非常敬佩唐朝名将郭子仪慷慨赴国难的气概，他常对人说：“郭子仪德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尝不来，挥之未尝不去’，‘任国家驱役，不计个人荣辱进退’，此是何等胸襟！我今日所处，也不能不如此啊！”

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正是因为他积极的人生观和务实的作风，使他站上了位极人臣的高度，他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圣相”。

为百姓做事讲究实在，这实在二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往往很难。很多时候，需要为官者深入到基层中去，才能真正亲身体察到百姓的疾苦，进而为他们从根本上排忧解难。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肯于为百姓做实事的人。

王安石二十三岁考中进士，他不愿在朝中为官，而是主动申请到地方任职。很多人对他这一举动很不理解，王安石对他们说：“做地方官可以直接为百姓干些实事，这要比在朝中无所事事要好得多啊！”

王安石在鄞县任职时，大兴水利，发动当地的百姓建造堤坝，使百姓收益很多。他还将官粮低息贷给穷困的百姓，解除了高利贷者对百姓的剥削。王安石在地方任职达十六年之久，他时时关心百姓疾苦，事事想着百姓，因此百姓对他十分爱戴。

后来，王安石做了宰相，他实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在这些措施中，王安石始终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这触动了官僚、地主的利益，这些人纠集起来，在皇上面前对王安石进

行诬陷、攻击，还要求皇上解除王安石的官职。

有人劝王安石不要和那些权贵相争，他对王安石说道：“你身为宰相，位高权重，如果因为替百姓谋利益而得罪了权贵，你自己就会被孤立，老百姓又不能让你保住权位，而权贵们却可以动摇你的权柄，你可要深思啊！”

王安石不以为然地说：“我一心为朝廷和百姓做事，绝无半点私心，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如果因为百姓而遭难，我又有什么遗憾呢？”

王安石的新政推行数年后，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正因为他为了百姓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人格，百姓才会永远记着他。做人只有像王安石这样，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实实在在，才有可能成就大的事业，才能得到后人的尊重。

和王安石相同，柳宗元任职期间也是主张朝廷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政策最终没有得到执行，但他这种为了百姓的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荣辱的精神，很值得后人学习和钦佩。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早有大志。入朝为官后，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史称“永贞革新”。“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是取缔“宫市”，免去民间对官府的各种积欠，放出大批宫女，不让宦官统领军队等。

由于牵扯到很多人的利益，革新一开始便遭到宦官、世族官僚以及藩镇军阀的反对。他们联合起来，一齐劝说柳宗元改变做法，停止革新，他们对柳宗元说：“祖宗的旧制已实行多年了，你轻易加以改变，做以前没人敢做的事情，不是很冒险吗？即使革新成功了，你本身也得不到什么；若要是失败了，必将遭大祸啊！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还是不做为好。”

柳宗元不为他们的话所动，坚持革新。他对官员们说：“做大事者就要敢于破旧立新，如果我抱残守缺，不求上进的话，我只能做一个庸俗的官吏，怎么能开创盛世、千古流芳呢？你们不要怕路途凶险，也不要怕辛劳麻烦，我相信我们做的事对国家有利，对百姓更有利。”

柳宗元更加坚定地地为革新之事操劳起来，他的家人劝他别那么拼命，他说：“我现在是为国为民做大事、干实事，哪里敢放松呢？勤奋不会把人累死，而整日无所事事却可以让人垮掉。”

后来，唐顺宗因病退位，太子即位后反对革新，把柳宗元等人贬出了朝廷，柳宗元被贬到偏远的永州。柳宗元对此一点都不沮丧，他对家人说：“鱼不游向大海、千里奔波，又怎能化为龙呢？我现在遭遇不幸，这是上天在锻炼我啊，我一定要挺住。”

十年后，柳宗元当上了柳州刺史，他继续坚持为百姓做事的原则，减轻赋税、鼓励生产、破除迷信，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

曾有人劝柳宗元给朝中权贵送礼，以谋求调回朝中任职，那人对他说道：“这里地偏人稀，环境恶劣，你不能在这里呆一辈子啊。你应该把心思多用在回朝任职上，不应该在这里干这些无聊的事。”

柳宗元听到这些话后非常生气，对那人训斥道：“从前在朝中，我不知民间疾苦，现在我在社会的最底层，从老百姓身上我学到很多东西。我为民办事，意义重大，怎么能说是无聊的事呢？”

柳宗元后来病死在柳州，当地的人民为了怀念他，纷纷集资为他建造了庙宇。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虚伪谁真心为他们做事，他们都看的很清楚。那些戴着伪善面具的家伙必将会被人民抛弃，而惟有那些踏踏实实做事的人才会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为官者在其职就应该谋其政，只有兢兢业业地做事，才能得到上级的赏识和老百姓的爱戴，那些只知道做表面文章的人迟早会被发现，而只有实实在在做事的人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范仲淹就是位经受住了考验的名臣。

范仲淹是北宋时代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他为人正直，经常向皇帝提意见。

有一年，国内发生了蝗灾和旱灾，江淮和京东一带最为严重。老百姓衣食无着、生活困

苦。范仲淹见到这种情况，心里非常着急。他请求宋仁宗派人去各地调查灾情，仁宗没有答应。

范仲淹生气的对仁宗说：“天子当以民为本，如果圣上您一天不吃饭，能忍受得了吗？”

仁宗一想有理，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命范仲淹为钦差，去救济慰问灾民。范仲淹所到之处，都命令当地的官吏开仓放粮，还免去了受灾地区的各种苛捐杂税。不久，范仲淹被派到苏州为官，恰遇那里闹水灾，范仲淹就亲自带人视察水势，用疏导的方法将洪水引入了大海，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宋仁宗见范仲淹能为百姓做事，对他特别赏识，便把他调到朝中，任命他做吏部员外郎，兼任开封府知府。

范仲淹为人正直坦率，他看到不合理的事情，就一定要管一管，这让他得罪了不少人。那时，宰相吕夷简权势很大，他总是安插自己的亲信在朝中做官，范仲淹对这种营私的行为很看不惯，于是气愤地写了一篇文章来指责吕夷简，说他用人不按照能力，而是完全只顾自己的利益，像他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宰相。

吕夷简对此事耿耿于怀，不久，范仲淹就受到了他的陷害。那是在讨论确立都城位置的时候，范仲淹认为洛阳和开封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在天下安定的时候皇帝可以住在开封，而一旦战争开始，皇帝就要住在洛阳了，因此他建议在洛阳盖好足够的房舍。没想到吕夷简却借题发挥，诬陷范仲淹浪费摆阔。仁宗一气之下，把范仲淹贬到饶州去了。

后来，西夏军来犯，宋军被西夏军打得打败。仁宗把范仲淹调到边关，以抗击西夏的进攻。

范仲淹接到诏书后没有丝毫地抱怨很快赶到了延州。刚到延州，范仲淹便着手训练军队。范仲淹非常爱护自己的手下，士兵们生活艰苦，经常有人出去抢老百姓的东西。范仲淹知道后，从军费里拨出一笔钱来，每月把钱分给士兵们。如此一来，士兵们的热情迅速高涨起来，当地老百姓的生活也逐渐安定了。

由于范仲淹是个爱兵爱民的将领，所以手下都愿意跟随他打仗。打仗时，战士们个个奋勇争先，连着打了好几个胜仗。西夏见北宋的边防非常牢固，士兵又如此英勇，就不敢再轻易来犯，只好与北宋求和。

范仲淹因功绩卓著而被调回朝廷，不久后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此时的北宋朝廷腐败风渐行，官员的数量惊人，多数官员不做正事，反而明目张胆地贪污钱财、欺压百姓。范仲淹对此非常气愤。不久后，范仲淹提出了十项治国良策，遂被宋仁宗采纳，史称“庆历新政”。

改革在仁宗的支持下迅速推行到全国，范仲淹也终日为此劳顿，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范仲淹一生虽多次被贬，但他的正直、高尚的品格却从来没有改变过。这种实实在在地做人风格让人倍感钦佩，他自己也真正实践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

统治者的本份是治理国家、造福百姓，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这个统治者就是不称职的。不称职就得下台，这是自然的规律。晋灵公因贪图享受而被杀的故事就有着很深刻的教训。

晋国的晋灵公继位后，贪图享乐、荒淫无度。他令宠臣屠岸贾建造一座花园供自己玩乐，屠岸贾为了讨好他，四处聚敛民财，大兴土木，很快在京城修建好了一座规模宏伟的花园，取名桃花园。

桃花园内栽种着各类奇花异草，喂养了多种奇禽异兽，还建有各种风格的亭台楼阁。园内建一高台，分三层，上有一座楼宇，称凌霄楼。楼内雕梁画栋、富丽堂皇、华丽异常。晋灵公对此感到很满意，整天带着妃妾宫女在园中玩耍。

有一次，晋灵公招一群歌舞艺人到园内表演，吸引了很多人在园外观看。晋灵公与屠岸

贾在凌霄楼内摆酒饮宴，观赏歌舞。

晋灵公心血来潮，想出一个取乐的主意：用弹弓射击园外围观的观众。屠岸贾立马拍手赞成，两人约定，击中眼睛者为胜，击不中者罚酒一杯，击中肩膀者免罚。两人便开始向人群发射弹丸，围观者纷纷躲闪，但因人数众多，难免有被击中者，叫苦声不绝于耳。

二人越玩越高兴，遂让左右会用弹弓的人都前来射击，一时间，弹丸如雨，群众纷纷中弹，哭声喊声响成一片，而楼上的人则高兴地哈哈大笑。从此，只要凌霄楼上有人，再也没人敢在下面行走了。

还有一次，晋灵公与屠岸贾一起饮酒，吩咐厨师做熊掌当下酒菜，晋灵公等不及，再三催促厨师上熊掌，厨师不得不将未熟的熊掌端了上来。晋灵公一吃，发现没熟，竟当即拿起铜锤猛击厨师的头部，厨师当场被打死，晋灵公又将其砍为数段，让人将其扔到野外去了。相国赵盾知道了这件事，指责晋灵公滥杀无辜，晋灵公遂对他怀恨在心，欲杀掉赵盾。

晋灵公的荒淫无度让赵盾的侄子无法忍受，他寻机刺杀了晋灵公，当时竟没有一个人出来救助，甚至全国上下为之欢庆，无人去责怪赵盾的侄子。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晋灵公为追求享乐竟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就是自作孽，他招致被杀的命运也属必然。他这个皇上做的太不实在，等他被杀的时候，没有人感到难过，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无独有偶，南北朝时的皇帝陈叔宝在荒淫方面比晋灵公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的结局也是如出一辙——自己葬送前途！

南北朝时期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叔宝，自幼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知民间疾苦，也不甚了解本国的实力及暗藏的危机。他终日和文人墨客饮酒赋诗，从不考虑国计民生的大事。

他一即位，便开始大兴土木，不惜劳民伤财。他曾下令建造了三座楼阁，每阁高达数十丈，均有数十间房屋，所有门栏、窗户等，都用沉香木制成，上雕金玉珠宝，外垂珠帘，内设高级床帐，微风吹来时，香味在数里之外都能闻到。他还吩咐属下在阁下建造假山水池，栽上各种奇花异草。他和宠妃们分居各阁，天天在里面寻欢作乐。朝中有事，他就与坐在他膝上的宠妃共同决断。

他对老百姓的疾苦不闻不问，整日沉迷于花天酒地之中。这其中巨大的开支，只有向老百姓去要，他开始向军人与士人征收关市税，税率还非常高。如此一来，每年的收入超过常年的十倍，朝臣施文庆、沈客卿等人更是作威作福，甚至以剥削百姓为事。

后来，隋军南下，陈叔宝此时还心存侥幸，称“王气在此”。及至隋军兵临城下时，他“仍然奏伎纵酒，赋诗不辍”。最终，陈叔宝被隋军所俘。

“成由勤俭败由奢”，统驭万民的君王在治国上，不但不提倡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反而以劳民伤财为能事，这便是为君不实，他对百姓不实在，百姓自然也就不会实心实意地拥护他，一个国家在这种君王的治理下走向灭亡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因此，做官为政就要讲究实实在在！

形势第二

[原文]

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以上摘自《管子》“形势第二”

[译文]

君主不像君主的样子，臣子就不会像臣子的样子；父亲不像父亲的样子，儿子就不守规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不相融洽，政令就不会顺利推行。君主的衣冠不端正，礼宾官就会

不严肃；君主的举止不合乎礼仪，政令就难以贯彻。

既关怀臣民，又有威严，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君主不能使臣民安居乐业，臣民就不会为君主分忧。君主不能促使臣民们生长繁殖，臣民们则不会为君主牺牲性命。

君主应当给予臣民的没有给，臣民们就不会全心全意地去报答他。

[实例应用与分析]

官者要讲究“为官之道”

“《管子》第一”中的上文部分表述了管子对“君子的模样”、“君主的衣冠”、“君主的举止”的分析和评判，同时又引用“父亲”与“统治者”来进一步说明，君主必须像君主的样子，官者必须像官者的样子，要想做好官、为好政，必须讲究“为官之道”。

什么才是为官之道呢——“既关怀臣民，又有威严，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反之，“君主应当给予臣民的没有给，臣民们就不会全心全意去报答他”。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官者要讲究‘为官之道’”。

管子说的对，官者要讲究“为官之道”，官者不同于广大民众，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不小，他们的做事方式必须本着“官者”的本分，时时刻刻恪守职则，做每一件事情都该尽心尽力，既为民做主，又能遇事灵活应变。

曾国藩很受后人的推崇，他做事讲究顺其自然，对官位不贪不恋，对钱财等身外之物也不感兴趣。他对自己还要求甚严，并立志为民做事。他后来能位极人臣、受到尊重也就不足为奇了。

曾国藩把官位看的很轻，他称“居官不过是偶然之事，一旦下野，也仍然是普通一员”。他为官期间，始终能保持良好的心态，认为自己从民间来，还归民间去，民间才是官员的根本。

曾国藩关心民众，奖励生产，治家之道讲究“耕读”二字，治世之道讲究“教养”二字。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为官者应具备以下品格：

一是责任。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

二是道德。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严以律己，以身作则。

三是才具。即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

四是态度。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勤教，严绳”，还自作三字箴：清字箴曰“名利两淡，寡欲清新，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箴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勤字箴曰“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对于这些品格，曾国藩认为皆因勤敬而得。

后人对曾国藩有着很高的评价。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曾国藩的为臣之道即是以勤为先、以民为本。这种质朴的思想贯彻在他为官的整个过程中，也是后人之所以尊崇他的原因之一。

为官之道很深邃，为君之道更是博大精深，能真正把这门学问做好的皇帝还真不多。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贤主之一，他一生建树颇多、功业辉煌，他的为君之道

就很受后人推崇。

公元 626 年，李世民登上皇位，史称唐太宗。他一登基就开始“偃武修文”，并以大治天下为施政方针，把行政的重点转移到医治战争创伤的文治方面来。

为了提倡文治，唐太宗亲身示范，他白天处理朝政，晚上挑灯夜读，常常连饭都来不及吃完就迫不及待地伏案苦读。他还经常在听证的间隙将学士们请到殿内讨论学术、切磋政事，有时竟至半夜方散。

通过读史，唐太宗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前代亡国之君都是因为操行不端、聚敛不止而招致亡国大祸。因此，他更加严于律己、孜孜不倦地处理政务，一点都不敢马虎。

唐太宗还总结出“民为邦本”的思想，他认识到一个王朝的兴衰，归根结底在于人心的向背，他认为君民的关系应该是“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他把舟比做君主，将水比做百姓，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还经常教育王子和百官“凡事皆须务本”。

唐太宗不仅认识到君主要以民为本须先正自身，而先正自身必先“节欲”。他说：“贪欲盛则花费广，花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必丧”。唐太宗经常对别人感叹：“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唐太宗身患“气疾”，住的宫殿又很潮湿，容易旧病复发。但他每每想到秦始皇大兴土木的教训，就不肯让人建造新的宫殿。他一再对手下说：“过去汉文帝想在骊山建一座饮宴游玩用的露台，找来工匠合计了一下，因要花费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钱财而作罢了。我如今功德不如文帝，而花费却要超过他，这就不为民之道了。”

公元 637 年秋天，大雨连绵，洛水暴涨，淹了洛阳宫，又毁坏了不少房屋，有六千余人在雨中丧生。唐太宗对洛阳宫稍加修缮后，将就着住下，然后下令把全部材料都分给城中房屋毁坏的居民，并把一时无家可归的灾民安顿在明德宫和飞山宫中，这在封建历史上实属罕见之举，由此可见唐太宗的“仁”是果真把百姓放在心上的。

唐太宗除爱惜民力、民财、不忘于民休戚与共外，还大力推崇重农务本、轻徭薄赋的政策。他积极推行均田制，曾将所查出的被侵吞的土地分给贫民，又下令将一些必征不可的徭役尽量安排在农闲的时候。公元 629 年，山东各州县发生严重灾荒，唐太宗下令免除灾区当年的租赋，还派使者赈济了万户灾民。

唐太宗的这些努力，使国力迅速恢复，出现了被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的盛世。

唐太宗统治下的唐王朝之所以能走上大治，主要是因为其遵循“为君之道”的缘故，他明白做皇上的应该为百姓做什么，而自己又需警惕些什么，像他这样明智的君主，历史上并不多见。

为君之道首先要黑白分明，身为万人之尊的皇帝，如果连是非对错都分辨不出，还怎么谈得上治理国家呢？

晋文公就是位明辨是非的皇帝，尽管他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用了些“诈术”，但他事后及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这还是为君有道，而且这“道”来的很灵活。

晋文公在城濮大战前曾召集群臣共商良策。晋文公先问咎犯说：“楚军兵多将广，而我军势弱，如何才能做到以弱胜强呢？”

咎犯回答道：“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对于礼仪的盛大从来就不会感到满足，而作战频繁的君主，对于诡诈之术从来就不会感到满足。您只要对楚国实行诈术，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晋文公又问雍季同样的问题，雍季说：“把池塘里的水放干了来捕鱼，怎么会抓不到鱼呢？但是第二年肯定就没有鱼了。把山林烧光了来打猎，怎能打不到猎物呢？可是第二年就都不会再有野兽了。使用欺诈的方法，虽然现在可以苟且得利，但以后就无法再得利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啊，大王还是慎重而行吧！”

晋文公考虑再三，最终还是采纳了咎犯的主张，从而在城濮大战中取得了大胜。

晋文公事后论功行赏的时候，却把雍季排在了首位。很多人对此感到不能理解。晋文公笑着对他们解释道：“咎犯的话是顾及一时，而雍季的话，却能对百世有利，哪里有把顾及一时的放在对百世有利的之前的道理呢？”

孔子对这件事评论道：“遇到危难而用诈术，足以打败敌人；回国后尊崇贤人，足以报答恩德。晋文公虽然不能坚持到底，却足以成就霸业了。”

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为官者当以“道”为重，有“道”是做人之本，有“道”也是受人尊敬的原因。

而身为皇帝的晋文公看中的也正是雍季的“道”。为臣者有“道”，可博得皇上信赖、官位常保；为君者有“道”，可深受百姓爱戴，江山永固。可见这为官之道是既简单又奥妙。

有时，皇帝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需要做出一些姿态。这种通过小事来传达意图的方法非常有效，也是皇帝笼络人心所常用的手段。这也是“道”，属于“智道”和“仁道”的范畴。

战国时期魏国的建立者魏文侯，礼贤下士、深得民心。当时，贤人段干木居住在魏国，魏文侯对他仰慕已久，但一直没有机会谋面。

有一天，魏文侯从段干木的门前经过，他双手扶在车前的横木上以表示对段干木的敬意。魏文侯的手下对他的这一举动颇为不解，有人便问道：“国君您为何要扶轼致敬呢？”

魏文侯说：“我在向段干木致敬啊。我听说，段干木把操守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即使拿我的君位与他的品德做交换，他也绝不会同意。对于这样的贤士，我又怎敢对他傲慢无礼呢？我只是在地位上显赫，而他是在德行上显赫；我只是在生活上富有，他却是在道义上富有啊！”

手下又问：“段干木既然如此高尚，大王为何不请他出来做相国呢？”

魏文侯觉得很对，于是亲自去请段干木出来做相国，但段干木婉言谢绝了。文侯没有勉强，而是赐给他丰厚的俸禄，还经常去他家探望。

魏国的百姓听说魏文侯礼遇段干木，都非常高兴，有人写诗赞颂道：“我们的国君喜欢廉政，把段干木来敬重；我们的国君喜欢忠诚，把段干木来推崇。”

不久后，秦国想出兵伐魏，司马唐劝谏道：“段干木是有名的大贤，而现在魏文侯礼待他，天下无人不晓，现在对魏国出兵恐怕会遭到百姓的反抗啊！”

秦王想了想，认为司马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取消了伐魏的打算。

魏文侯以尊贤的举动彰显了自己的仁德，天下的百姓都拥戴他，天下的士人也都乐意归附他，这就是为君之道。有了这样的“道”，任何霸业都能成功，多么强大的敌人也都不在话下了。

为臣和为君相似，做事也讲究“道”，这为臣之道用好了，不但可以使自己平步青云，而且还可以在一些棘手的问题上起到一招致胜的效果。

古代时，有个固安县县令叫梅衡湘。固安县的宦官们，并不把一个小小的县令看在眼里，经常故意刁难梅衡湘，梅衡湘却都能心平气和的从容应对。

一次，一位宦官送给梅衡湘一副猪蹄子，目的是想要梅衡湘为他讨债，于是梅衡湘命人烹调猪蹄，设宴款待宦官，并把欠钱的县民叫到官府来，斥责他们欠钱不还。县民们却纷纷哭诉自己的贫穷，梅衡湘大声怒骂说：“宦官大人好心借钱给你们，你们竟敢哭穷赖债，今天你们一定要还清所有债务，否则我就打死你们！”县民们都哭丧着脸离去。

一旁的宦官不免有些心软，梅衡湘察觉宦官态度没那么强硬了，再度把欠钱的县民叫来，皱着眉对他们说：“我也知道你们很穷，但是我实在出于无奈，现在为了偿清债务，只有卖掉你们的妻儿来还钱，但我不忍心让你们骨肉分离，所以就宽限你们一天，今夜就与妻子诀别吧，此生恐怕不能再相聚了。”

县民们听了，忍不住痛哭失声，宦官也不禁掉泪，当场打消讨债的念头，并且把借条都

撕毁了。其实，这正是梅衡湘所要的结果。

还有一次，一位胡人酋长拿着几十两铁来进献，对梅衡湘说：“这是我们沙漠新产的铁。”梅衡湘心里暗想：“根本不会有这种事，他们是希望我放松禁铁的命令啊！”

梅衡湘没做声张，而是慰劳了酋长并将他送回。梅衡湘用铁铸了一把剑，剑柄刻上某年某月某王赠，同时发了一个公文到边界地区，称胡人地区已经产铁，今后不必再卖给他们铁锅。

后来胡人缺锅，又派人提出要铁的请求。梅衡湘说：“你们国已有铁了，可以自己铸锅嘛。”胡使者知事情败漏，慌忙认罪，再也不敢在梅衡湘面前说谎了。

为官之道重在为民，有时候为了群众的利益，甚至可以“不择手段”，此道便是机智、便是擅于变通。此外，还要“见什么人，行什么道”，梅衡湘利用自己的机智让胡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智道。

除了智道，为臣者还需磨练自己忍的功夫，这便是“忍道”。有时候，为了国家的利益，个人的利益不得不暂时放在一边，这需要虚怀若谷的心境，也需要宽阔豁达的胸怀。

郭子仪是唐朝时的名将。当朝皇帝唐代宗宠信奸臣程之振和鱼朝恩。程之振专门在朝内坑害正直的大臣和将领，鱼朝恩则掌握了朝中军权。安禄山反叛时，郭子仪率军平叛，收复失地，屡建奇功。鱼朝恩对此很是妒嫉，他多次在代宗面前进谗，郭子仪遂被罢免了兵权。

公元763年，吐蕃党项人大举入侵，一时边关告急。吐蕃兵很快攻入了长安，郭子仪收拢各路散兵四千余人，号召将士拼死一战。郭子仪亲率这支残兵直取长安，吐蕃兵望风而逃。收复长安后，郭子仪因功勋卓著而更加受到鱼朝恩的嫉恨。鱼朝恩常在唐代宗面前说郭子仪兵权过重、不可不防之类的话，想将郭子仪置于死地。郭子仪为人宽宏大量，一心为国为民，一点也不与鱼朝恩一般见识。

后来，吐蕃又以数万之众围困灵州，郭子仪率军解了灵州之围。郭子仪的名声从此更大了，而鱼朝恩见郭子仪又立了大功，不由得气愤之极。鱼朝恩派人将郭子仪父亲的坟给挖了，这在古代是极其侮辱人格的行为。郭子仪权衡再三，在这国难当头的局势下，他还是选择了隐忍。

因为郭子仪以大局为重的高尚品德，加上他的英勇善战，唐王朝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吐蕃兵暂时不敢轻易来犯了。由于郭子仪对唐朝做出的巨大贡献，唐德宗即位后郭子仪被尊为“尚父”。

郭子仪的为臣之道便是不计较个人得失，能够为了国家的利益而顾全大局，这种品德真的是非常难得。

纵观古今，那些讲究为君之道的帝王都能把国家治理的井井有条，那些讲究为臣之道的官员们也都能把任务完成的很出色。可见，有了“道”，事情也就变得简单起来，做事还需讲究做事之道。

形势第二

[原文]

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一“形势第二”

[译文]

万物对于人类，是没有亲疏远近之分的，所以聪明的人用起来有余，笨拙的人用起来不足。顺应天道行事的，天就帮助他；逆天道而行的，天就会违背他。得到天帮助的，弱小可以变为强大；与天违背的，成功可以变成失败。